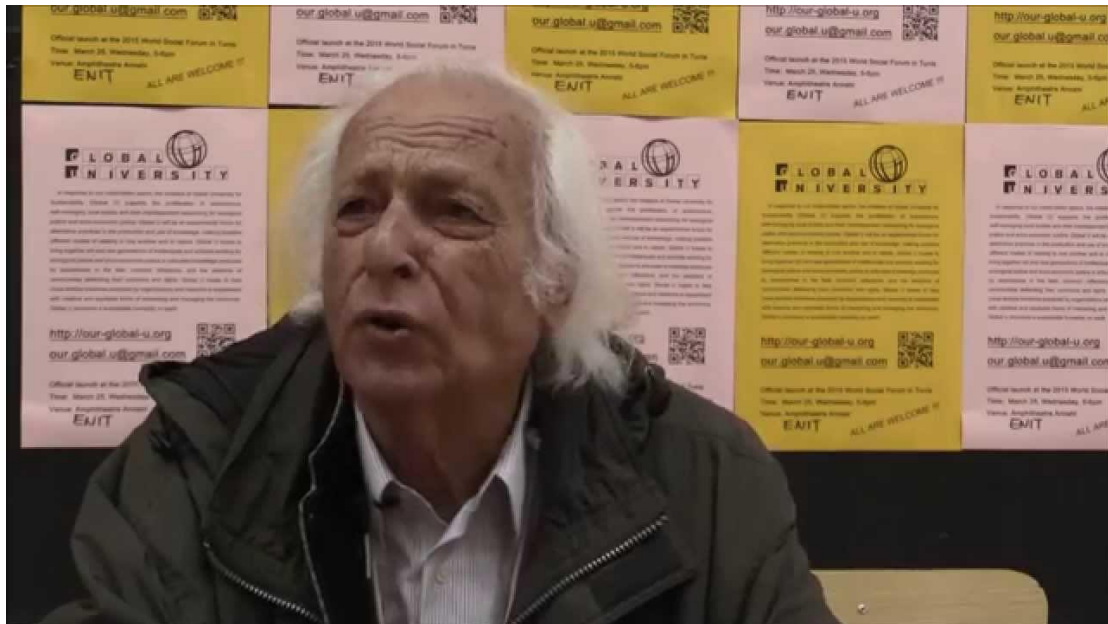


薩米爾·阿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譜系、現狀與未來

2015-12-29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盜火”

埃及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明在《每月評論》(2014年6月)上發表了題為《朝向社會主義的民眾運動：統一性和差異性》。文中對當代世界中幾股主要的激進左翼潮流譜系進行了分析，並提出左翼統一行動的倡議。該文主要論點如下：



我們都明白，就這些運動所實行的策略來講，很難劃清有效和無效之間的界限，也很難判斷策略的目的是否與實際情形相衝突。總的來說，許多運動都可以被稱作“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movements toward socialism)”，這個詞語是近幾十年來一些南美國家(如智利、玻利維亞等)的政黨發明的。這些南美政黨放棄了傳統共產黨的目標(奪取並掌握政權，建設社會主義)，而代之以明顯較為溫和的目標，即耐心創建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和政治條件。這種目標調整可以用兩點概括，即民族化和國家計畫。至於用什麼樣的具體方法使現

代經濟管理社會化，這些選擇了“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的政黨並沒有給出界定。這些將自己刻畫成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和政黨有一些聲稱是馬克思的繼承者，有一些甚至聲稱是蘇聯共產主義以及（或者）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

在現代世界的建構中，法國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按照今天的話，即團結），這套價值觀將現代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歸根結底，這套價值觀是資本主義能夠接受但卻無法實現的，如果要真正實現這些價值觀，則需要更高層次的社會文明。在這個意義上，法國革命遠非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它隨著雅各賓派的上臺提出了超越資產階級革命的訴求。在這套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激勵下，美國也提出了革命口號：自由和私有財產。這兩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業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們不承認任何超越該原則的平等訴求。自由和私有財產二者結合起來讓不平等成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為個人才能和勤奮的結果。他們讓人忽略團結的美德，而只承認相反的一面，即個人和企業之間的競爭。究其本質，自由和平等是彼此衝突的兩種價值觀，只有資產階級財產被壓制的時候，這兩種價值觀才能和解。

法國革命即使在其最激進的雅各賓階段，也沒有壓制資產階級財產，而是仍舊保護私有產權，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並認為這種產權可以通過家庭小農場和手工企業的方式進行普及。它還不能理解資本主義會怎樣發展，會如何強調現代資本主義財產的集中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個被理解為優越於資本主義的文明階段，正是在逐漸認識到“自由、平等、團結”這些口號的真正含

義的過程中被提煉出來的，它要求以工人集體財產權代替少數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財產形式。

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譜系

現代人民發起鬥爭運動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帶來的挑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工人的剝削。這些運動有些是自發的，有些則是受到社會主義團體的推動而發起的。這些運動在工業革命的歐洲出現甚早，尤其是在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稍後也在德國、歐洲其他地方以及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出現。它們在整個 19 世紀持續擴展，並在 20 世紀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革命的或改良的。

還有其他一些運動爆發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邊緣地區，比如那些作為服從資本主義統治中心的積累需求而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隨著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展，世界也呈兩極化的發展態勢，即控制中心和被控制的邊緣地帶，兩者之間呈現非對稱的發展態勢，這種不對稱因資本主義的制度邏輯而逐步惡化。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構成一個事實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反抗既定資本主義體制的鬥爭通常都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主體的目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了“複製、趕上”富裕的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然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在誕生之初就受困於一種依附關係（他們本質上就是“買辦”該稱呼最早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提出的），因此他們不能重塑自身，使自己成為可以擔負起真正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按照第三國際共產主義的話來說就是“反封建”。這種由自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領導，由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社會聯盟所執行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常常可能成為反資本主義的戰爭。為此，這些民族和國家的解放運動也常常超越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標，可以被算作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

我們需要研究“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的三種譜系：第一種是在資本主義中心發起並擴散的，第二種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半邊緣地帶發起的，第三種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邊緣地帶發起的。這三種運動從未標榜自己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但是它們中有些可能會成為這種運動。

1 . 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譜系

在 19 世紀，法國比歐美更早產生了廢除資本主義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組織的新觀念。執行這種進步觀念的人來自雅各賓派的繼承者，他們的理論也為法國革命工聯主義者所信奉。在這些最初的理論者看來，自治生產合作制能夠為財產社會化提供制度和法律框架。

在整個戰後快速發展時期，能源事實上成為不用花錢的物資。因此，在帝國主義的中心地帶，對於 1975 年開始的資本主義反擊、快速發展期的終結以及工人獲益的結束，工人階級沒有給出有力的抵抗。同樣，對於前第二國際各黨和工會仍然奉行的修正主義路線也沒有任何抵抗。因此，這些黨和工會之後就僅僅是社會-自由主義的了。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達成“共識”的社會接受了“永遠的資本主義”、去政治化，代替工人 / 市民的是一群旁觀者和消費大眾。

然而，在帝國主義中心地帶，資本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消失並非如人們所相信或假裝相信的那樣不可改變，伴隨著資本統治而來的反抗鬥爭的再度興起，預示著社會主義運動可能會再度崛起。

2 . 世界資本主義半邊緣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列寧主義譜系）

蘇聯社會由列寧主義—布林什維主義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受到了該國客觀條件的限制，它的落後及其具有的半邊緣性資本主義性質，迫使它不得不將“建設社會主義”降格為建設國家社會主義。當然，國家社會主義有別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如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仍然是服務於壟斷資本的體制，而國家社會主義則具有兩點非常不同的本質：

一是它至少能通過大膽的社會政策讓自己合法化，是工人權力的代表；二是它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保持相獨立的關係。這種國家社會主義充滿了逐漸向社會主義進化的可能，但它也具有很大的僵化風險，最後可能會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復辟而向右轉，正如葉利欽和戈巴契夫治下的蘇聯所發生的。如果是托洛茨基，那麼歷史會向好的那面發展嗎？對此，筆者持懷疑態度。這也是第四國際（實際上只是第三國際的第二版）一直不過是一群演說者在那不停嘮叨列寧主義的原則，卻不能超越這些原則的原因。史達林以及後史達林體制甚至從未嘗試超越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分層化和中央計畫）階段。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卻做出了這種嘗試，但是遭到了莫斯科的排斥。這種排斥不是偶然，就其在世界舞臺上的行動水準來看，第三國際當時已經逐漸將社會主義運動的所有戰略服從於蘇聯的策略需求，而後者只關心抵制資本主義的包圍需要什麼。萬隆時期形成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理論要求放棄任何戰略，只服從手段。現今，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邊緣地區，只能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來提出一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運動概念，不是與列寧主義的傳統決裂，而只是超越它。這就構成了另一種社會主義運動的譜系。

3．世界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譜系

回望過去，萬隆時期是亞非民族解放運動勝利開始的時期，他們本來充滿了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機會，但是結果呢？這個問題不能籠統回答。的確，在先進的民眾運動擴展的某個時刻，社會主義運動似乎成為可能。比如，葉門和蘇丹就曾經是這樣。在非洲，許多組織和領導了民族解放的執政黨都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有的甚至自稱是馬列主義的，這種宣稱並非為了蠱惑人心，它表達了進步團體的目標和其群眾基礎。然而這些執政黨都強調“人民的統一”，卻否定了社會利益的差異性。

不善於處理這種矛盾關係導致這些政黨止步不前，喪失合法性，並最終回到當代帝國主義及其幫兇的羊圈中。在狂躁的歷史中，這些自稱為馬列主義的政黨沒能使運動朝向社會主義發展。最主要是因為他們堅持國際共產主義內的莫斯科陣營：他們投身莫斯科所宣導的“非資本主義路線”就是最有力的證明。結果，這些黨最終只成為整體右傾的權力體系中的左翼而已。就印度來說，前印度共產黨的分裂、與國會結盟、組建以毛主義為指導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也沒能帶來質的飛躍，沒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印度版。印度共產黨的失敗有多種原因，比如種姓制度的神聖性以及印度民族的多樣性。但是印度共產黨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都已經通過選舉進入了政府，取得了不容忽視的進步，卻沒能將印度聯邦的力量對比扭轉為朝著有利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發展。它沒能超越業已取得的成績，而是逐漸被體制所“吸收”。我們不得不承認它失敗了，這個黨分裂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行動卻在尼泊爾取得了一些成果，並粗略地勾勒了一場可能的社會主義運動。

承認差異，統一行動

按照資本積累的邏輯，很容易將社會結構簡單化，關於這一點有幾個錯誤觀念：一是認為資產階級 / 無產階級的對抗會消除其他社會力量的政治表達，二是認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會成為具有微小內部差異的同類陣營，三是認為資本的全球擴展會使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的社會結構趨於相似。

過去 30 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欺騙”下，壟斷資本主義以這種方式在全球傳播：（1）普遍但是呈碎片化的無產階級化；（2）在中心和邊緣都處處實行壓制，削減各種獨立於壟斷之外的經濟行為；（3）以抽象的資本統治形式替代以前的資本主義組織。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一個由金融寡頭雇傭、持有高額薪水的雇傭工人組成的階級。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發展並沒有帶來相對的社會穩定，反而導致社會退步，引發大眾反抗。它也沒能帶來新的中心、邊緣關係的相對穩定，相反它導致對抗和衝突升級。以美、日、歐三巨頭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中心不再能維持它們對全球的統治，只能對全球強化軍事控制。面對華盛頓及其同盟的地緣戰略部署，新興國家和民族也通過伸張主權施以抵抗，從而導致南北衝突升級。而在邊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與缺乏民族和民眾合法性的國家權力機構結盟，進而控制這些國家，這又是導致各民族抵抗的另一原因。

在我們面前，普遍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以多種形式內爆，一個新的革命時期正在展開。我們該如何行動才能將可能變成現實，以推進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呢？回答這個問題也需要我們再次反思這個關係：行動上的戰略統一和參與運動的各民族在社會、政治構成上的差異。在過去，只要對統一、差異這對辯證矛盾關係做出具體的回應，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有所前進。解決這兩者並不是

要求否定其中一個，而是要將兩者 的對立轉化為互補。成功處理這兩者關係的案例有 1917 年的俄國革命，列寧向參與暴動的各派民眾提出一個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平和土地，從而將各股勢力統一起來。

而在中國，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毛澤東就通過聯合貧農重振中國共產黨，從而有了 1949 年的勝利。俄中兩個案例都是對挑戰做出具體的回應，抓住了關鍵性差異。解決這種矛盾不存在統一的公式，當代各國的關鍵性差異也各不相同。對處理這種矛盾關係，在此總結兩點提議：（1）在帝國主義中心，激進左翼必須勇於提出將壟斷性財產通過民族化、國有化充公，同時制定措施將這些財產的管理民主化、社會化。這就要在每個階段找出共同的階段性目標，從而構建統一行動；（2）在邊緣地帶，激進左翼必須能認清組成社會聯盟的不同成分，為此它首先必須知道這個聯盟的共同階段性目標。只有滿足了這些條件，社會主義運動才能穩步、漸進地改變現有社會。

本文摘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 年第 10 期，譯者朱美榮。